



本报记者 赵恩霆

鸡蛋价格背后的民生危机

近期，受禽流感爆发后大量家禽被扑杀等诸多因素影响，伊朗国内市场上的鸡蛋、禽肉价格不断上涨，涨幅超过40%（有报道称涨幅超过一倍甚至数倍）。2017年12月28日，位于伊朗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民众忍不了了，率先走上街头抗议物价暴涨。

其实，涨价只是伊朗当前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伊朗经济长期高通胀、高失业率的窘境。这种局面下，去年8月开始第二任期的鲁哈尼政府却在去年12月初向议会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中，明确将削减社会福利、上调燃油价格，从而引发底层民众更大不满。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里伊朗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平均通胀率为17.8%。

1990年代，伊朗温和改革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执政期间（1989—1997），平均通胀率升至25.28%，最高时曾超过49%。他的“门徒”哈塔米总统执政期间（1997—2005）平均通胀率降至15%左右。

强硬保守派总统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2013），通胀率再度回升并一度高达30%。到鲁哈尼2013年上任时，通胀率已达34.7%。因此，降低通胀率是鲁哈尼当初竞选和上台后的主要承诺和执政目标。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前的2017年3月，伊朗的通胀率降至个位数9%。不过，目前通胀率又升至两位数。

内贾德时期凭借高油价积累了财源，并以此直接向民众发放补贴。但鲁哈尼上台后正赶上国际油价暴跌，伊朗财政收入大减，迫使其通过削减福利、上调油价来减轻财政负担，触及了中下层民众的底线。

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后，部分制裁被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恢复至正常水平，经济显著增长，但石油收入并未转化为民生改善，非石油经济凋敝，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持续攀升。

更重要的是伊朗当前失业率超过12%，而全国8000多万人中，约七成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群体的失业率更是高达40%。当愤怒的年轻人遇到Telegram、Instagram等社交网络媒体，马什哈德“乱了”的消息迅速向伊朗中西部地区传播，示威活动在2017年最后两三天蔓延至设拉子、伊斯法罕、库姆、加兹温、阿瓦士、扎黑丹、克尔曼沙赫、大不里士等数十座大小城市，并波及首都德黑兰。

刺耳口号声中的认同危机

还是马什哈德，这里不仅是伊朗第二大城市，还是什叶派宗教圣城之一，堪称强硬保守派教士的“大本营”。当这里

2017年12月28日，受禽流感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飙涨，位于伊朗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最先乱了。接下来的几天，抗议示威借助社交媒体向首都德黑兰等中西部多地蔓延。2017年最后一天，总统鲁哈尼首度发声。2018年1月2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开口表态。1月4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示威总体上趋于平息。

这场骚乱绝不止经济因素那么简单，背后闪现着以教士阶层为代表的伊朗强硬保守派的身影，也多少受到美国、沙特和以色列等域内外死敌的鼓动。更刺耳的是，示威者还喊出反政府、反对外政策、反政体甚至反最高领袖的极端口号。如此看来，即便这场骚乱真如伊斯兰革命卫队所言趋于平息，也势必会影响伊朗今后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走向。

危机边缘的伊朗



站在最高领袖画像前的伊朗总统鲁哈尼

的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物价飞涨时，还喊出“鲁哈尼下台”一类的口号。

这次伊朗跨年骚乱发生后，英国广播公司将其称为2009年以来伊朗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2009年那次，大选中败选的总统候选人、改革派人物穆萨维指责选举不公正，引发数百万人抗议选举结果。

自1990年代以来，除了内贾德执政的8年，温和改革派人物在大部分时间里稳坐总统宝座。也正是从内贾德任内开始，温和改革派与强硬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2013年，总统宝座回到温和改革派手中，继承拉夫桑贾尼政治衣钵的鲁哈尼当选总统，他当时直言“温和路线战胜了极端主义”。

不过，鲁哈尼接下来四年的执政路并不平坦，尤其是他主张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政策，遭到国内强硬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伊核协议达成后，在支持者看来这是鲁哈尼的一大历史功绩，却被保守派视为“屈辱”。

2017年，鲁哈尼击败强硬保守派教士莱希，成功连任。有意思的是，始于马什哈德的这次骚乱，正好是在鲁哈尼宣布将取消女性“强制佩戴头巾”的法令之后。而且，马什哈德还是莱希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此人一度被认为是哈梅内伊最有力的接班人选。

因此，本轮骚乱也被认为是强硬保守派在借机向鲁哈尼施压，迫使其下台。但骚乱的演变随即超出了保守派的预期，其他城市的示威者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了保守派和教士阶层——鲁哈尼政府新财年预算中，仍对多个隶属于高级神职人员的宗教研究机构拨款数亿美元——纷纷喊出“改革派，强硬派，都滚蛋吧”“我们越来越穷，神职人员却开着漂亮汽车”等口号。

更刺耳的口号还在后头。随着示威活动在伊朗全国不断蔓延，抗议人群中甚至出现了焚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画像、高呼“去死吧”等极端行为和口号。这种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不敢想象的事情，令世界震惊。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政教合一的政体，最高（精神）领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可终身任职，但不参与行政机关日常运作。政府实行总统内阁制，行政事务由总统领导的内阁负责，总统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国家领导人，任期4年，仅可连任一次。

自1990年代以来，哈梅内伊与温和改革派总统之间保持着合与斗的动态平衡。但自内贾德时期以来，在温和改革派与强硬保守派之间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哈梅内伊往往被认为更倾向于保守派一些。

可是，如今占伊朗人口主体的年轻人出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他们不但对那场颠覆性变革无感，甚至还会在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累积并爆发时，刻意放大伊斯兰革命之前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世俗化的社会风气，导致现在的特殊政体面临认同危机。

内外失衡引发的外交危机

“我们都是伊朗人，我们不接受阿拉伯人”“革命卫队去死吧”……示威规模扩大后，民众还将矛头对准了伊朗近年来在中东推行的外交政策，及其主要执行者伊斯兰革命卫队。

2011年中东多国政局动荡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保守派的内贾德政府看到了反击沙特为首的逊尼派海湾国家阵营的机会，加紧在地区国家扶植或巩固利益代言人。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援助巴沙尔政府，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叙利亚派遣军事顾问和特种作战人员，同时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援助，帮助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国”作战；在也门支持什叶派胡塞武装推翻亲沙特的政府，与沙特进行代理人战争……

几年下来，伊朗塑造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并摆出通过也门进一步延伸的架势，在地缘政治格局上形成对以色列和沙特阵营的反制。

既然要四处出击，就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源。2014年初时，伊朗政府为援助巴沙尔政权而投入的财政资源就已超过150亿美元，且这一数字在之后不断增加。在国际油价暴跌导致财政吃紧、国内经济和民生问题凸显的情况下，伊朗这种“大手大脚”自然会引发民众极大不满。

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支由最高领袖直接创建并领导、掌握导弹研发的武装力量，其地位甚至比伊朗正规军还重要。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后，开始利用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巩固权力，后者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评估，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了伊朗军工、能源、交通、建筑、电信和外贸领域的许多企业，尤其是在军工和电信领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而在外贸领域，其开办和控股的500多家企业，控制了伊朗一半以上的进口和超三成的出口，每年可获得约120亿美元收入。

然而，伊朗的特殊政体及其与军方的关系，导致其在运行中难免会出现大量利益集团和腐败现象。不可否认的是，伊朗的地区外交政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执行效果，确实为伊朗创造了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周边环境，有利于伊朗发展经济。但当中下层民众发现，连外国都能享受到伊朗的好处，而唯独自己被遗忘在角落时，自然会走上街头。

可以说，伊朗这次跨年骚乱是其内政外交失衡后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示威民众的诉求过于多样化，而且相较中东其他国家，伊朗政府在处理示威活动等类似危机时更具经验，这也注定此次骚乱很可能昙花一现。但无论结果如何，骚乱势必会促使伊朗调整今后的内外政策，连带着整个中东局势下一步都会受到影响。